



略述《洛陽伽藍記》的寫作

曾經擔任過北魏的撫軍府司馬、秘書監和奉朝請的期城太守楊銜之所著的五卷《洛陽伽藍記》，乃是一部以洛陽佛寺四十年興廢為題而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由盛到衰的情況，以及北魏同周邊的國家與地區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中印間的交通狀況）進行詳盡地記錄，反映一個時期、一個王朝、一個京師和一種宗教的歷史性的游記文學。它的文字雖然不多，但它本身所具有的既優美秀逸又煩而不厭的文筆、豐富的內涵和珍稀的史料卻足以使它能夠像《水經注》和《齊民要術》一樣，成為北魏王朝百餘年統治期間所絕無僅有的三部傑作之一，並一直為世人所矚目。

常言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楊銜之既然自稱是「才非著述，多有遺漏①」，卻還要花費諸多的心血來從事《洛陽伽藍記》一書的寫作，其原委與動機究竟何在呢？

①「因循世職，無所為。」——高帝王莽，心無奉即靈，應導二道。其（八）出於見寒，對行乘氣，飛龍飛龍，聯里即即香，懸其出家，相用，不勝會期。其後樂彭彭志（而）必為心門香，不問其位。

據史料記載，洛陽原本與中國的其它地方一樣，都是沒有佛寺的存在，只是到了東漢明帝在公元六八年將佛教請入京城並為之建造了白馬寺之後，那裏才有了撞鐘的和尚以及供其起居修道的佛寺。儘管佛教在入傳之始就受到了官方的禮遇，但由於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而使得漢人都無權享受出家的利益和自由，佛教的發展也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抑制」〔直到晉懷帝永嘉（公元307—312年在位）末年，洛陽的佛寺才僅僅有四十二所〕。然而到了北魏孝文帝於公元四九五年遷都洛陽之後，不可多得的機遇竟使佛教得到了空前迅猛的發展——不僅寺塔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湧現，而且其建築也無比地奢華。別的且不必說，就單是由靈太后於公元五一六年親率百官而在洛陽城內的太灶之

西表基立刹並於次年落成的永寧寺中那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②」的「九層浮圖③」，在一馬平川的豫西平原，即使是「去京師百里④」，也足以「遙（而）見之⑤」，以致於「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⑥」。它的上面「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鑱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百二十鐸……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綉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則）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⑦」。就連其佛殿，縱然是「須彌寶殿，兜率淨宮⑧」；也肯定是「莫尙於斯⑨」的。雖然這只是衆多的洛陽佛寺之一，但其所耗的費用就已「不可勝計⑩」，何況那「其數甚衆⑪」的官方及私人所修建的寺塔呢？據有關的資料統計表明，公元五一八年的洛陽共有佛寺五百餘所，而最多的時候曾一度達到過一千三百七十六所，數目之巨，實在是空前絕後。對於當時的這種建寺修廟的風行盛況，楊銜之曾在他的《洛陽伽藍記序》中這樣寫道：「逮皇魏受國，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資，競摸山中之影。金刹與靈台比高，廣殿並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綉、土被朱紫而已哉！」

二、佛教興起的社會背景

雖然在帝王們的努力之下，北魏境內能於傾刻之間樹立起三萬餘所寺院，平添二百萬之衆的僧尼，翻譯出一千九百多卷的三

藏教典⑫，但是有誰能夠想像得到，對於佛教甚是熱衷的北魏統治者鮮卑貴族原來竟是和認爲「佛是戎神⑬」才「所應兼奉⑭」的「出自邊戎⑮」的後趙之主石虎一樣，是沒有佛教的信仰的，只是到了取得了政權之後，爲了有別於奉行儒學路線的漢人並求得民族的團結與國家的凝聚力，它才千方百計地推廣起佛教來。

作爲開國之祖神元皇帝的後裔，太祖拓跋珪在公元三八六年統一北方，而正式建立大魏政權的時候尙對於佛教一無所知，自然，對於佛教的信仰也就無從談起。不過，隨着其與東晉交往的日漸頻繁，道武帝拓跋珪不但知道了佛教、了解了佛教，而且還親自歸信並竭盡全力倡導了佛教——他不但下詔讓趙郡的法果法師來擔任紹隆佛法、統領衆僧的沙門統，向泰山的僧朗法師致禮問候，而且即使在外出的途中遇到了沙門，他也總是要一一「致敬⑯」的。明元帝時，倍受崇敬的沙門不但在京邑平城的四方新造了許多的佛像，而且還挑起了敷導民風民俗這一工作的重擔，法果也被晉升爲僧統。對於佛教（尤其是佛教中的禪師），太武帝在剛登基的時候還是非常崇信的。（否則，他怎麼會請玄高禪師來充任太子拓跋晃的老師呢？）雖然他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而於後來轉奉了道教，甚至「普滅佛法⑰」，使得「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⑱」，但因其爲時甚短，大多數的佛教經像和財物等等也都被成功地隱藏並保存了下來，所以它實際上並沒有造成佛教元氣的大傷，甚至還爲佛教在其身後的復興留下了足以燎原的火種。果如其然，文成帝於公元四五二年年上台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詔興佛：「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而）欲爲沙門者，不問長幼，（凡）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⑲」因爲他總是認爲，「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

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
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
等生死者嘆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
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以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
常所尊事也^⑳」。不僅如此，他還明確地指示，全國應「大州五
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台者十人，各當局分^㉑」，否則就不
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㉒」。

就在文成帝打破漢人不準出家的傳統之時，北魏在建寺和造
像方面的開支與規模也在不斷地擴大。比如，公元四五四年的秋
天，文成帝曾「敕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
五，各長一丈六尺^㉓」，所用去的「赤金（即黃銅）^㉔」竟達
「二萬五千斤^㉕」之多。公元四六六年，獻文帝則在平城「起永
寧寺，橫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又於
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㉖」。而在皇興年間，他「又構三級石佛圖，椽棟楣楹，上下重
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即都城的別稱）壯
觀^㉗」。到了公元四七七年的時候，「京城（這裏指平城）內寺
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
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㉘」。雖然北魏的中央政府於後來喬遷到了
洛陽，但佛教陣容日漸壯大的趨勢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被推波助
瀾到空前的程度。在遷都之初，「善談老莊，尤精釋義」^㉙的孝
文帝，因爲暫住於王南寺東邊的金庸城中而無法抵禦來自地利方
面的誘惑，經常是「數詣沙門論義^㉚」，甚至「與名德沙門談論
往復^㉛」。其嗣宣武帝不僅「篤好佛理^㉜」，而且還「每年常從
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名義旨，沙門條錄爲內起居焉
^㉝」。而其後不久，政府爲了在洛陽南邊的伊闕山上爲高祖、文

昭皇太后和宣武帝營造三所石窟（這乃是繼魏初的雲崗石窟之後
的又一項規模龐大的工程），竟不惜動用和花費了八十萬二千三
百六十六個工次和二十四年的時間！在這種行爲的帶動之下，王
公大臣們能不對佛教倍加崇尚嗎？事佛的狂潮又怎能不席捲全國
呢？以致於到公元五一五年的時候，「徒侶愈衆^㉞」的北魏境內
的寺院竟達到了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比四十年前增了一倍還
多。

而在這場自發的風起雲湧的運動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能
反映人們的崇佛風尚的非洛陽的永寧寺而莫屬了，因爲它那壯
觀的規模和雄偉的氣勢在當時的世界上，是除了皇宮之外的其它
任何的建築物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就連那位雖是「起自荒裔
^㉟」卻曾經「歷涉諸國^㊱」而「摩不周遍^㊲」的，已有一百五十
歲高齡的禪宗第二十八代祖師（也即東土的初祖）——菩提達磨
「來游中土^㊳」而初涉洛陽之時，也深爲它那「金盤炫日，光照
雲表；寶鐸生風，響出天外^㊴」的「奇功^㊵」而「歌咏贊嘆
^㊶」，甚至「口唱南無，合掌連日^㊷」！

然而，那時的佛教之所以能有如魚得水的形勢，假如單是依
靠當權者的提倡與支持還顯然是不夠的，（因爲它所起的只是潤
滑劑的作用），真正的能夠促使佛教得以迅速發展的，乃是普遍
地存在於北魏社會的嚴酷的現實、佛教本身的理論優勢和佛教對
於政府支持的迫切需要。因爲作爲外來的宗教，要是離開了官方
的支持而去獨立謀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佛教就不可能有它的
今天；而北魏又是長期處於戰亂之中的我國南北朝時期的北方五
胡十六國之一，處在階級和民族這兩座大山壓迫之下的廣大勞動
人民本來就生活得極爲艱辛，卻還要忍受戰火的蹂躪而朝不保
夕，他們又怎能不對宣揚慈悲、平等與自由的佛教產生信賴之情

呢？至於那些帝王將相等顯貴之流，儘管他們可以「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④③}」，甚至達到「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台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④④}」的程度，但他們當中有誰能夠像「臣有兩手，唯堪兩匹（就已）所獲多矣^{④⑤}」的侍中崔光那樣廉潔呢？可以肯定地說，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只不過是一些想通過對佛教的「信奉」，而使自己得以富貴千秋的貪積無厭之輩罷了（要不然，章武王和陳留侯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任太后大賞群臣之時，因「負絹過性^{④⑥}」而「蹶倒傷踝^{④⑦}」的）。誰不知他們奉佛的一舉一動都幾乎莫不是「往返累宿，鑿游近旬^{④⑧}」呢？在農民的莊稼被「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沓，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④⑨}」的情況下，「士女老幼^{⑤①}」能不「微足傷心^{⑤①}」嗎？既然「廝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喧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哭相望。霜早爲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敝^{⑤②}」而「自近及遠，交興怨嗟^{⑤③}」，既然人民的生計日益難謀，那麼又怎能不迫使那些「逃役之流、僕隸之類^{⑤④}」爲了「避苦就樂^{⑤⑤}」而紛紛遁入佛門，致使建寺之風「雖有顯禁，猶自冒營……比日私造，動盈百數^{⑤⑥}」呢？

閻羅王曾經對洛陽禪林寺的僧人道弘說過：「雖造作經像，正欲貪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即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⑤⑦}。」事實也正是如此。公元五一八年的時候，「僧寺無處不有^{⑤⑧}」的北魏，所出現的「寺奪民居^{⑤⑨}」的現象居然有「三分且一^{⑥①}」之多。它們「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⑥①}」，使「梵唱屠音，連檐接鄉……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⑥②}」，儼然是一改

過去的那種「闡教多依山林^{⑥③}」的作法，轉而形成了戀慕城邑的風氣和充滿人間氣息的特色，儘管在世界上並非只有「湫隘是經行所宜，（而）浮喧必棲禪之宅^{⑥④}」。實際上，這種「俗眩虛聲，僧貪厚潤^{⑥⑤}」的現象之所以難以避免，乃是因爲大家都「利引其心^{⑥⑥}」而「莫能自止^{⑥⑦}」的緣故，因爲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真正的「修道者^{⑥⑧}」。而《魏書·釋老志》中所作的「正光（即公元520年）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的論述，不也是對此所發出的雖是無可奈何，卻也實在是不堪忍受的一針見血的無聲控訴嗎？

三、滄桑之變

飽經滄桑的北宋文學家蘇東坡曾經說過：「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⑥⑨}。」的確，盛筵尙且難再，勝地又豈能常久^{⑦①}？正當北魏的佛教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全國卻驚雷大作，霹靂乍起。而待其「灰飛烟滅^{⑦①}」之後，昔日那繁華的京都（這裏指的是洛陽）卻早已「城廓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邱虛。墻被蒿艾，巷羅荆棘^{⑦②}」，除了「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踟躕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⑦③}」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了。

面對昔日的桑田所變成的滄海，雖然，痛心疾首者有之，爲其惋惜者有之，莫名其妙者也同樣有之，但能夠像楊銜之那樣深究其因的卻未必有之。

俗話說得好：「紙包不住火。」北魏社會表面上的繁榮是不可能永遠掩蓋由寺僧數量的高速增長，所帶來的不安定因素的消

極影響的。我們知道，在一個人口相對穩定的國度之中，僧侶數量的激增不但會使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力銳減，而且還必然會影響到國家的經濟建設和財政收入。而爲了應付整年累月的戰事和修建寺塔的需要，政府的開支不但可能有絲毫的減少，而且還會不可避免地要與日俱增，從而進一步地助長了更多的雖然尚在土地上耕種，卻不堪再忍受日益沉重的賦稅負擔的人逃亡到寺院當中的風氣。而這樣的必然結果，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增稅與逃役之間的惡性循環，削弱國家的總體實力，最終使社會上「無執戈以衛國，有饑寒於色養^{⑦④}。」而與此同時，那些爲國捐軀者的家屬更是不顧國家的大局，拼命地給正在高漲的崇佛大潮推波助瀾——不斷地「捨居室以施僧尼^{⑦⑤}」，使得京城內的宅第房舍「略爲寺矣^{⑦⑥}」。隨着這種「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⑦⑦}」的現象愈演愈烈，社會矛盾的激化、國家政權的衰亡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

著名的唐代文學家王勃認爲，「時運不齊^{⑦⑧}」就必然「命途多舛^{⑦⑨}」。深深得益於上層社會的扶植才發展起來的佛教事業，不可能不隨着它的政治靠山的坍塌而風轉直下，喪失其往日的風采。就連達磨祖師所稱的那座即使是「極佛境界，亦未有此^{⑧⑩}」的洛陽永寧寺，也早在一場大火之中化爲灰燼而蕩然無存了，從而驗證了太武帝的奉佛可以招致「五服之內，鞠爲邱虛；千里蕭條，不見人跡^{⑧⑪}」的預感。

當然，在北魏的統治集團內部，能夠對「皇輿遷鄴^{⑧⑫}」早有預感的先見之明者並非只有太武帝一人。李崇就曾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說過：「宜罷尙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並減瑤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鑿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⑧⑬}，」以即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⑧⑭}。」以國家大局爲首

要考慮對象的陽固在自己的《上讜言表》一文中認爲，政府要想「救饑寒之苦^{⑧⑮}」來「存元元之民^{⑧⑯}」，就必須得「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即「沙門」一詞的別譯）無用之費^{⑧⑰}」。侍中崔光也曾誠懇地勸諫說，只有「罷勞形之游，息傷財之駕^{⑧⑱}」才是安邦治國的明智之舉。在《上疏諫崇佛法不親郊廟》一文中，張普惠則毫無顧忌地以「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邊，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⑧⑲}」，這樣激烈的言辭來批評政府對於佛教的過分熱衷，以爲「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⑧⑳}」，不如「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⑨①}」。而作爲北魏的大司空與尙書令，王澄則更是直言不諱地在《奏禁私造僧寺》的表文中指出，盲目的崇拜乃是導致佛教「侵奪細民，廣佔田宅^{⑨②}」的癥結所在，是「有傷慈矜，用長嗟苦^{⑨③}」的愚蠢的舉動。然而非常地遺憾，最高決策者竟然一點也沒有把他們所提出的忠告當作一回事而放在心上，而是任憑社會矛盾的積累與發展，以爲「講寺之中^{⑨④}」會「致有兇黨^{⑨⑤}」，都是由於「奸淫之徒得容假托^{⑨⑥}」的緣故，是不可能完全予以避免的正常現象。因此，他們對於「關心國事」者的慷慨陳詞不但不予褒獎，反而還會在有的時候以懲相加，致使沒有人再敢有半句的多嘴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政府不能使老百姓生有寧日的情況下，在各種矛盾的日趨激化，而漸漸地使北魏王朝的統治大廈再也無法支撐下去的時候，醞釀已久的永熙之亂終於爆發了，從而敲響了那預示着它即將壽終正寢的警鐘。

四、因緣會遇

公元五四七年，面對眼前那殘破淒涼到「鐘聲罕聞⁹⁷」的故國京都及其寺觀廟堂，再想想過去的它那梵音繚繞的繁華盛況，因行役洛陽而故地重游的楊銜之禁不住為之悲惜垂淚起來。一貫是主張唯有「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尊，師徒無濫。即逃役之徒，還歸本役⁹⁸」才能「國富兵多，天下幸甚⁹⁹」的他又怎能不由於撫今追昔而感慨萬千呢？

或許，正是因為那過深的感觸才促使他去設法搜羅諸多詳實的材料以「追叙故跡¹⁰⁰」。他克服了重重的困難，用自己那能與酈道元的《水經注》相「肩隨¹⁰¹」的秀逸文筆，以洛陽當時的重要寺院為主，「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¹⁰²」，「凡是和「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跡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¹⁰³」相關的事情都「莫不巨細畢陳，本末可觀¹⁰⁴」，足以補魏收（即《魏書》的編者）所未備，為拓跋之別史¹⁰⁵」，而不僅僅是些「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覆¹⁰⁶」的普通的「遺文逸事¹⁰⁷」，從而出色地完成了「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¹⁰⁸」的《洛陽伽藍記》一書的寫作。假如他沒有良史之材，倘若他不會擔任過秘書監之類的職務，而對於當時的檔案管理及其材料有所熟悉，如果他對於當時的文藝和社會生活缺乏高度的重視、敏銳的洞察、深入的了解、深刻的理解與體會，就根本不可能會整理出既主次分明、詳略得當又內涵豐富的《洛陽伽藍記》，更不會有甚麼可以補《魏書》的不足之處而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所選用的價值存在了。

所以，楊銜之創作《洛陽伽藍記》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提

醒當時的政客，更為重要的，則是為了使後來者不再重蹈前人的覆轍。如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¹⁰⁹！」

（完）

附引文出處：

①……出自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序》。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出自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卷一·永寧寺》。

⑩⑪……出自魏收的《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⑫……出自《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其中曾有「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的記載。

⑬⑭⑮……出自黃懺華的《中國佛教史·東晉時代之佛教·佛圖澄》。

⑯⑰⑱……出自黃懺華的《中國佛教史·北朝與佛教》。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出自《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 29……………出自《魏書·紀七》。
- 30……………出自《洛陽伽藍記序錄》。
- 31……………出自《魏書·韋閔附韋續傳》。
- 32 33 34……………出自《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 35 36 37 38 39 40 41 42……………出自《洛陽伽藍記·卷一·永寧寺》。
- 43 44 45 46 47……………出自《洛陽伽藍記·卷四·王子坊》。
- 48 49 50 51 52 53……………出自《魏書·卷六十七·崔光傳》中的《諫靈太后幸嵩高表》。
- 54 55……………出自唐代高僧道宣律師的《廣弘明集·高識傳》卷末。
- 56……………出自《魏書·任城王澄傳》一文中的《奏禁私造僧寺表》。
- 57……………出自《洛陽伽藍記·卷二·崇真寺》。
-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出自《魏書·任城王澄傳》一文中的《奏禁私僧寺表》、《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以及《全後魏文·卷一十七》。
- 68……………出自《廣弘明集·高識傳》卷末。
- 69……………出自蘇東坡的詞《水調歌頭·中秋》。
- 70……………出自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的《滕王閣序》，其中曾有「勝地不常，盛筵難再」之語。
- 71……………出自蘇東坡的詞《念奴嬌·赤壁懷古》，其中曾有「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之句。
- 72 73……………出自《洛陽伽藍記序》。
- 74……………出自《廣弘明集·高識傳》卷末。
- 75 76……………出自《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 77……………出自《廣弘明集·高識傳》卷末。

- 78 79……………出自《滕王閣序》。
- 80……………出自《洛陽伽藍記·卷一·永寧寺》。
- 81……………出自《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
- 82……………出自《洛陽伽藍記序》。
- 83 84……………出自《魏書·卷六十六·李崇傳》或《全後魏文·卷三十五》。
- 85 86 87……………出自《魏書·卷七十二·陽尼附傳》或《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 88……………出自《魏書·卷六十七·崔光傳》或《全後魏文·卷二十四》。
- 89 90 91……………出自《魏書·卷七十八·張普惠傳》或《全後魏文·卷四十七》。
- 92 93……………出自《魏書·任城王澄傳》或《全後魏文·卷一十七》。
- 94 95 96……………出自《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或《全後魏文·卷一》。
- 97……………出自《洛陽伽藍記序》。
- 98 99……………出自《廣弘明集·高識傳》卷末。
- 100 101……………出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
- 102……………出自《洛陽伽藍記序》。
- 103 104 105 106 107 108……………出自吳若準的《洛陽伽藍記集證序》。
- 109……………出自《洛陽伽藍記序》。